

论隐喻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

——以欧盟扩大为例

[德]赖纳·许尔森*

摘要 近年来,言语行为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本文在指出建构主义方法论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隐喻可以成为社会现实的建构方法的理论。在这方面,以已知换未知原则是隐喻的本质,借助隐喻,抽象之物成为易被接受的现实,实现抽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动转换。隐喻在欧盟扩大上的运用促进了欧盟扩大现实的建构。

关键词 话语分析 隐喻解读 欧盟扩大隐喻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 (2008) 03-0015-22

一、引言

政治演讲中隐喻无处不在。观察一下联邦议院关于欧盟扩大的辩论,人们便能发现,其中许多东西与理智的政治决议没有关系。

鉴于政治学中定量观的说服力,人们期待对隐喻进行积极的研究。如今这类研究远远不够:虽然在政治学讨论中隐喻被频繁使用,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 国际关系学情况也是如此。^[2] 这方面令人惊讶的是,在“建构主义转向”过程中这一学科分支对语言和话语有着一定的兴趣。^[3] 《国际关系杂志》也曾发表过关于“话语”的文章(Risse-Kappen 1995; Genschel/Plümper 1996)。^[4] 但如同建构主义视角下对国际关系的讨论一样,关于语言的讨论还处在较肤浅的状态。值得强调的是,这点不仅对建构主义温和学派,而且对建构主义激进学派都适用:两派虽然以话语内容和论据为研究对象,但几乎未涉猎文体或语言手段。最新的实例是上期《国际关系杂志》上刊登的以“语言突出地位”为主、包括欧盟扩大话语观点的文章。此外,这也适用于的“话语行为”概念,但不同于其名称,这个概念的使用也是以论证为研究对象。总之,对于政治学学者来说,修辞学似乎无关紧要或不够体面。话语行为建构现实,这一点却常被人忽略。现实不只是通过言语内容,也通过言语表达方式建构而成。国际关系学只关注和洞察建构现实这一话语层面。本文旨在揭示这些学科所疏忽的部分,希望以此唤起人们对迄今为止被看作是修辞手段、因而只让位于语言学的“语言现象”的兴趣。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隐喻是社会现实的建构工具。为了解释这个观点,我将重点放在隐喻的现实建构功能方面:隐喻如何建构现实?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让人想到

* 赖纳·许尔森(Rainer Hülsen)博士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国际政治首席教授,此文翻译得到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建构主义核心问题之一——社会现实是如何形成的？随着以解释为主的现代建构主义盛行，在国际关系学中这一建构主义重要课题也被遗忘。本文旨在阐述，隐喻是如何借助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现象建构社会现实，如家庭机构被应用于像欧盟东扩这样的抽象现象。

从理论上分析隐喻如何建构现实，这对实证分析帮助不大。在此，需要一个隐喻分析方法。本文将奠定这样一种理论，以此弥补以建构主义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不足，建立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建构主义方法论基础，以此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虽然建构主义也被视为一种方法，在实证论建构主义和后实证论建构主义之间有过激烈的认知争论，但或许正是这一争论，至今对主体间现实的认知方法和其后果没有展开过讨论。

鉴于只有在实践中见证方法的实用性，本文试图通过实例，阐述隐喻分析法是如何被应用的。这方面，我将视角放在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和土耳其的扩大上，关注隐喻建构欧盟扩大这一现实，阐明隐喻理论和隐喻使用方法。因篇幅原因，本文不能对欧盟扩大隐喻进行全面的分析。^[5]

二、本文对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之处

建构主义建立于国际关系学之中。在此，本文无需对建构主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不需要去讨论建构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我将直接进入建构主义内部的辩论，在此确定本文的学术定位和其超越目前的辩论水平的程度。

社会现实是主体间建构的结果，这个普遍认同的观点构成了建构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即便这一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在认识论上仍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痕：其一边是温和的，或更精确地说，拥有实证观的建构主义者；另一边是激进或后实证论的建构主义者：前者试图将建构主义本体论与实证主义认识论互相结合，即用理性主义分析物质世界的方法或用自然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后实证论则认为，前者的大胆尝试必然走向失败。在探讨治理理论时，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和约翰·鲁杰早在1986年已发现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必然存在于前者中：一方面假设所审视的对象（政权、规则、本体或观念）有着主体间性，另一方面出于研究目的又将主体和客体进行剥离。被说明的现象只要不是治理理论或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建构主义研究对象，就具有主体间性特点，因为这类现象也可被看作是从外部视角可观察的客观因素。

建构主义温和派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观念和认同解释，借助观念和规则对本体的阐述，规范效用和规范内化或面向理解的行为效用。简而言之：人们将视角更多地放在观念因素效用。对观念如何产生、现实如何建构等问题，建构主义温和派还欠思考。规则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只研究国际规范的“构成性作用和限制性作用”，对“规则如何产生及其失效问题没有给予理论上的回答”。只要建构主义温和派不面向社会现实是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接受人们对其只停留在表面化的质疑，“建构主义看上去并没有深入研究社会层面”。

后实证论建构主义将社会现实的形成置于其研究中心，明显地涉猎社会世界，并从 Max Weber 的研究基础上入手，以“研究意义和现实建构为主”，由此奠定的建构主义可解决以下问题：Emanuel Adler 当初错误地为所有建构主义者辩白，“所有类型的建构主义者都不关心事物现状，只是关注事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状态。”但事物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的样子？激进建构主义观点认为，语言是理解这个现实变化过程的钥匙，我们借助语言对这一过程赋予意义。观念、规则、认同以及其它精神要素都是依靠语言建构的。现实只有通过语言行为

和话语模式得以建构，也就是说，重塑观念的形成过程意味着对建构观念的话语形式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看，“建构主义将视角放在语言上”或“话语建构主义”说法是恰当的。

当然，后实证论建构主义者也并非提供最佳方案，因为，第一，他们的研究也停留在语言字面理解上，第二，后实证论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薄弱。就第一点而言：后实证论建构主义实证话语分析只关注话语内容，即表达了什么。^[6]但现实不仅仅在语言的表层得以建构，而且也在表层下面，即以什么方式，如何表达。对此，社会学诠释学有着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对之，我在下文给予详细的阐述。因此，（就意义而言），重要的是，不仅仅使用过哪些观点，同样重要的是，说话者在哪里停顿，以什么语调和音量说话，提出哪些话语问题，以什么方式使用哪些隐喻。话语分析没有关注句子之间生成的意义，而只是将视角放在文本表层，这样只重塑由话语方式建构的现实表层。话语分析应少一点表层、多一点深层，激进建构主义分析更应关注语言的第二层面，即语言如何被应用的这一层面。人们特别呼吁关注语言的建构作用，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呼吁至今仍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对于激进建构主义研究来说，一种特有的矛盾得以证实：理论上已确认语言多于内容和观点，但话语实证研究忽视语言的建构层面。

后实证论建构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方法论。这里，既没有一个能引领我们去认识语言建构社会现实的方法，又没有对或许存在的方法进行过实质性讨论。^[7]与众所周知的标准化社会学方法相比，语言研究和话语研究不仅不够细致，而且也尚欠清晰。虽然也有类似于标准途径方法：话语分析，但其如何进行，对之也较为模糊，如同 Jennifer Milliken 所说的那样，“显然缺乏对合适方法的审核和对话语分析的标准”。^[8]当然，把话语分析视为自由方法的委婉表达方式也过于夸张，少数实例论文对具体做法的解释占有过多篇幅，^[9]话语分析家如何进行研究，没有明确的阐述。^[10]即使在视野超出专业界限时，人们也弄不清话语分析是什么，是如何进行的。因此，社会心理学话语分析最著名的代表 Jonathan Potter 和 Margaret Wetherell 将无法解释的情况视为话语分析的特点。话语分析与传统方法之间的差别犹如骑车和烘烤蛋糕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话语分析犹如骑车，做实验或分析调查数据犹如按谱烘烤蛋糕，这里没有从报告单档案中撰写分析结果的机械程序。如同骑车一样，将分析过程转化为抽象概念并不容易。

与此具体做法及类似行为相比，Reiner Keller 认为，话语分析行为只提供“有限的辅助”。这方面操作方法的建议只局限于一般层面，它们“只能成为话语分析的某一特殊方法”。鉴于这一认知，Keller 主张不要把话语分析看作是社会学方法，而是更多是研究纲领，我觉得这也有道理。在这方面，除较少受人关注的称谓分析法和方法仍不清晰的隐喻分析外，在国际关系学中这一研究还不完善。因此，现在是到了更加完善后实证论建构主义理论的时候。

三、隐喻理论

隐喻构建社会现实，这构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为确定隐喻是如何建构社会现实，本部分首先概述古代修辞学和现代语言学对隐喻的不同理解。为说明隐喻话语特点，本文将重点放在隐喻的跨文本性和跨话语性功能方面。最后对隐喻的作用作一阐述。

总体而言，对于日常生活世界外的事，我们一无所知；而理解感官不能感知世界的唯一途径在于，将日常生活世界同抽象世界进行相似性转换。这方面可借助人们熟悉的参照物，使抽象世界被人理解。这种将已知运用于未知的原则构成了隐喻的本质。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及观念被用在抽象世界，使之成为人们已知的现象而被人接受。如在欧盟被喻为家庭时，

其成员国如家庭成员便可决定，何人、何时、因何而被家庭接纳为成员。成员国行使着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如何使隐喻的自明性和去政治化与其不确定性相互协调？因其模糊性，隐喻不能表达事情未公开的层面，这为误解和曲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我认为，这两点是完全同一的：隐喻不仅有单义性（即自明性），也有多义性。隐喻单义性形成于其建构的现实现象领域，即便隐喻使用者，对之也一无所知。真实现象有着丰富的内涵，而这正是基于隐喻得到再塑造。（……）

四、隐喻分析方法

在对隐喻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探析后，本章节将介绍隐喻分析是如何进行的。鉴于目前还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隐喻分析法，人们应在话语分析研究范围内确定相应的隐喻分析法。

在通常情况下，迄今为止的实证隐喻分析在方法上不易被人理解。虽然这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结果，但它们是如何获得的，对之人们还是较为模糊。人们怎样解释隐喻，如何确定隐语特定意思；在试图理解隐喻时，人们又是如何去解读，这构成了隐喻分析的主要困难。在隐喻解释——我将它称为真正的隐喻解读，发生在主体间时，隐喻分析才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隐喻理解方式。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日常性的，就隐喻核心而言，其真正解释是个直觉的问题。因此，想创立一种借助严格操作规则、从隐喻中获取意义的解释技巧，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我还要说明的是，让自身或别人弄清解释技巧，由此获取隐喻含义，这虽然是可能的，但目前隐喻的微观分析方法比较落后，对隐喻分析与话语宏观层面的结合也没有系统研究。这种结合是什么，这构成了本章节所要关注的问题。

社会学视角下的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

本文对后实证论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其话语分析更多关注论点和内容，也就是说，只关注说了什么。我认为，现实是由话语表达方式建构的。这一观点源于社会学诠释学，它反对只关注文本表层意义的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在文本表层下还有意义生成的第二层面，即现实建构与“字里行间”意义相互关联。社会学诠释学旨在“在方法控制下穿越文本表层信息内容，挖掘出更深层次、潜在的或隐性的含义”，由此更好地确定社会现实的建构特征。

社会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赞同转向语言表达方式。对它们而言，语言的这一层次同文本性的概念相互关联，它们反对以逻辑和理念为中心的传统文本阅读方式，要求关注语言话语层面。“一些读者将作者试图或宣称要表达的意思抛开，或忽视这些意思，或在特定意思下以流畅的句子去建构语篇”。后结构主义和社会学诠释学一方面对此看法一致，即意义不仅仅形成于在（逻辑）论证过程中，而且也生成于语言话语第二层面。另一方面它们对古典诠释学旨在确定主体所表达的含意的中心愿望也不感兴趣。一个人在说话时，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传播特定意义，在这方面他在撒谎或者说出实际想法，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字里行间有着语言话语第二层面。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可以掌握它，但不能对其进行控制。对社会学诠释学来说，这一层面有着潜在的含义，后结构主义将之称为亚文本，说话背后的现实在这一层面得到建构，这符合上文所述的话语隐喻理解方式。隐喻所表达的内容要多于话语语言，我们说话的方式所表达的意思要多于我们在说什么。更准确地说：在话语行为中，

我们所说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说的。

将隐喻分析与社会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进行结合，这为我的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一种旨在挖掘潜在含义，即对亚文本解释的基本态度。对解释者在解释隐喻时做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没有具体的答案。

人为愚蠢法。

在诠释实践中，隐喻分析者在做什么？这里所推荐的技巧是装傻方式，或者用 Umberto Eco 的话来说：“一个隐喻解释者应该站在隐喻初次理解的层面上。”

科学家拥有丰富的知识，这也是成为科学家的原因所在。从社会学诠释学视角看，这无疑危险的，这将导致科学家把许多事物看作是显而易见或不言自明。其理解方式都是习惯性的。这种理解方式与日常理解方式没有不同。为了避免这一理解陷阱，社会学诠释学提出了“人为愚蠢”法。因完全理解不能做到，人们试图与原有的知识保持距离；对事情尽可能少一点理所当然的理解方式，排除常规知识，从民族学视角去分析研究对象。在这方面，文本也是获悉文本内容的唯一途径。在这种分析技巧中，背景语境显得非常重要。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摆脱已知知识和背景知识，解释因显而易见性而被定量分析法所忽视、认为不需要解释的那部分内容，对之进行“原则性的怀疑”。通过这一人为愚蠢法，人们可以透析出文本潜在的含义。在这方面社会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彼此相距不远，虽然这一点无论哪一方都似乎没有意识到。人为愚蠢法让人想到后结构主义者所追求的对传统现实进行“去自然化”的目标。因此，要与因理所当然性而被人接受的事情保持距离，使之“陌生化”。这一陌生化/去自然化过程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引导人们如何去诠释的技巧，而只是一种诠释的基本态度，或按 Der Derian (1989) 所说那样，是“组合策略”和“智力活动”：“我们的组合策略是通过详细解释、解构或变更传承的语言、概念和语境。在国际关系中，这些语言、概念和语篇形成一种特别的话语。在这方面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可称为后现代或后建构性方法。这一建构过程与其说是一种形式，倒不如说是一种智力行为，它对人们所熟悉的语言进行陌生化（以此表明话语是如何形成，而不是怎样反映事实）。这种方法打乱了国际关系中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里，我依然没有发现后结构主义和社会学诠释学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日常诠释实践中，即便在 Der Derian (1989) 那儿，文本分析也是模糊不清。我把人为愚蠢法确定为我的实证隐喻分析主导方向。

就隐喻诠释而言，应用这一技巧意味着，人们不再把习以为常的隐喻看作是某一表达方式的“自然”替代方式，而是在其主观假定的显而易见性后探寻其具体的背景，如入盟国接近欧盟的隐喻似乎在描述一件显而易见、不需要具体解释的事。就人为愚蠢法而言，如果假定人们对欧盟一无所知，那么对这一隐喻诠释是感知欧盟扩大意义的唯一途径。隐喻诠释也在激活隐喻所包含的日常生活特有意义，将之用于抽象对象。通过几个单独步骤，这一人为愚蠢法可减缓阐释过程，确定因在关注明显部分而被人忽略的隐喻含义，如入盟国接近欧盟的隐喻是按照入盟国单向接近欧盟而建构的。入盟国单向走近欧盟，欧盟则盘踞在大本营内。这一不对称性或许没有引起政治学的注意；另外，在扩大问题上欧盟被比喻为要塞，除欧盟被建构为与外界隔绝和拥有难以渗透的实体外，要塞隐喻还有一种含蓄的意义，即对欧盟来说入盟候选国是一种威胁，因而须借助要塞加以制止，保护自己。

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

我上文所描述的是微观层面的分析,即隐喻和其关联语境^[1]的分析法。如果我只关注话语行为中的单个隐喻,而不是整个话语行为,即话语行为的宏观层面,那我的做法不能被确定为话语分析。在话语分析文献中有人抱怨,实证研究要么将视角放在这一层面,要么放在另一层面,很少有人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进行结合,或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语言学研究也不是在更大的上下文中探究语言意义,而是在语言细节中迷失方向;而“法国话语分析”在探索话语结构时不是更细致地审视单个文本。在此,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隐喻分析法可以使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相互结合。这两个层面是如何相互结合,下文将作一介绍。

微观分析也要兼顾宏观分析两个步骤。在微观分析前要先审视整个话语方式或文本本身,确定话语情境中的隐喻,对反复出现的、明显的、约定俗成的隐喻进行归类。在这方面,约定俗成的隐喻对话语分析来说是十分重要。它们与创造性隐喻的不同性在于其跨文本性,隐喻使话语行为有序化,让人理解话语对象的建构。例如,依靠宏观分析研究的第一步,人们便可为欧盟扩大确定隐喻范围和隐喻方式,如房屋,道路,关系和组织等。在微观分析第二步开始前,在关联语境下对隐喻进行详细的诠释。这里人们会用人人为愚蠢法,到这一步隐喻分析也告结束。这些研究结果只是对不同的隐喻及其建构进行概述,所欠缺的是对单个结果进行跨文本分析,即转向宏观层面。我的隐喻分析增加了第三步,即探寻各个独立建构方式所具有的共性,如在欧盟扩大话语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隐喻都将扩大建构为一种长期的、不对称的过程,将扩大问题建构为认同问题,这构成了欧盟扩大话语隐喻的基本特征。这种建构方式巩固了扩大话语方式,使所有文本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扩大一致性。第四步是,基于跨文本性,在宏观层面确定,隐喻在特定情况下是否与其话语方式或所建构的现实有关,扩大话语与欧盟认同话语有着何种关系。在这方面扩大话语融入认同话语,而认同话语形式又变成扩大话语的“元叙述”话语方式。

五、隐喻是如何建构欧盟扩大的

本文论点是,现实(也)是话语生动表达生成的结果。对之本文将借助实例进行深入的探析,如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和土耳其的扩大问题:德语欧盟扩大隐喻是如何建构欧盟的扩大?换言之:扩大问题究竟涉及什么?

如同上文所述,欧盟扩大的隐喻将欧盟扩大建构为一个艰难的、不对称的和具有认同性的事件。在其他地方,我已对哪些隐喻建构欧盟扩大作了详细的描述。这里,我想集中阐述扩大现实这一方面,即扩大问题被建构为认同问题。我的分析文本是1990年至2000年联邦议院关于欧盟对土耳其和中东欧国家扩大的讨论快速记录。这里只对少量的、地区性的、阶段性的、来源受到限制的扩大话语进行截面剖析。由此获得的结果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达到原有的设想,但还有助于欧盟扩大话语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

在第一段我将阐述,哪些隐喻参与欧盟扩大问题中政治认同的建构,鉴于隐喻的跨话语性,弄清隐喻是如何使扩大话语与欧洲认同话语联系在一起。当然,隐喻不仅将欧盟扩大问题界定为认同问题,而且也决定了,入盟国在哪些方面须满足欧盟成员国的认同要求。

欧盟扩大问题是认同问题。

总体上讲,家庭隐喻、回家隐喻和愈合隐喻构成将扩大问题建构为认同问题的三个传统隐喻,它们强调扩大问题,即:只有欧洲国家,才可入盟。由此突出了扩大问题的欧洲认同

性，确定扩大话语（扩大决定）的中心层面，使扩大话语单一化，使扩大话语具有跨文本性。把扩大话语同欧洲认同话语连在一起，这佐证了隐喻所拥有的跨话语性作用。

家庭隐喻将欧盟扩大比喻为“家庭团聚”，入盟候选国被当作是“我们的欧洲兄弟”，是欧盟成员国的兄妹。这里，欧洲被视为大家庭，入盟候选国和欧盟成员国同属于“欧洲大家庭”。在很长一个时期欧洲大家庭成员彼此分离，欧盟扩大才使它们彼此相聚在一起。把国家视为人这种比喻方式使国际关系更容易被理解和实施。

回家隐喻把入盟比喻为“回到欧洲家乡”，或者是“返回欧洲”。这里，入盟国被赋予了人的特征。对入盟国来说，回家或返乡的前提是，它们返回曾经呆过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欧洲成为入盟国的故乡。它们曾经离开了家园或被赶出家园——隐喻不能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原因，但欧盟扩大又使它们回到故乡，“在我们的意识中，布拉格、华沙和布达佩斯又回到了原本属于它们的地方：回到不可分割的欧洲”。

最后，愈合隐喻将欧盟扩大解释为“融合欧洲”。这一隐喻将欧盟扩大不是界定为人际间的关系，而是生理愈合过程。这里，入盟候选国和欧盟成员国被想象为折断为两截的骨头。不管骨折原因是什么，通过欧盟扩大断裂的骨头又重新愈合。扩大便是这种愈合的过程，使“原本属于同一整体的东西又长到一起”。

这三个隐喻在多大程度上使欧洲扩大问题成为认同问题？按照我的解释，它们把欧洲建构为一个自然实体，使回归欧洲看似自然产生，优先于每一社会行为，因为人们不能选择出生地，也不能选择家庭。在认同理论语言中人们或许说，隐喻奠定了欧洲认同，给人们带来一种特有的幻想。

入盟国被建构为欧洲的一部分，是欧洲认同的最初载体，是欧洲自然一部分。由此奠定的欧洲回归属性使入盟国同欧盟成员国之间不存在差异，彼此成为同一自然体。由此可见，欧盟扩大被建构为原始状态恢复的过程。欧洲的扩大旨在结束欧洲人为的分离，共同的政治机构在奠定欧盟成员国和入盟国之间的共同认同，或用隐喻方式说，欧盟扩大允许欧洲国家按其自然天性生活。

由家庭隐喻和回家隐喻共同建构的入盟国和欧盟成员国本源性也有情感性，即在家庭和乡村才感知到的“我们感情”。如同认同研究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归属感构成了共同认同的组成部分和共同特征。这里显现的情感效应源于隐喻的作用。这种效应在文学中被描写为隐喻。（……）

如上文所述，扩大隐喻将欧盟扩大建构为认同问题：这里欧盟扩大不再是在哥本哈根条款基础上做出的理性政治决定，而是接受原本属于同一整体、情感紧密相连的国家，也就是说，涉及到欧洲认同问题。将欧盟扩大提高到欧洲重新统一高度，这使欧盟认同的意义远远超越经济和政治因素。把欧盟扩大解释为欧洲认同的重建，这可减少人们对欧盟扩大的反对态度。欧盟是否需要扩大，这已不再是需讨论的问题。“欧洲性”成为接受入盟国的唯一标准。入盟候选国是否是欧洲国家，这成为欧盟扩大决定的关键因素。

（王志强译）

注释:

[1] 起初关于隐喻分析的研究主要出现于政治理论 (Miler 1979; Münkler 1994; Rigotti 1989), 以及政策研究之中 (Gamson/Modigliani 1989; Donati 1992; Nullmeier/Rüb 1993)。

[2] Paul Chilton,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New York, 1996; Jennifer Milliken, "Metaphors of Prestige and Reput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Realism", in Francis Beer and Robert Hariman eds., *Post-Realism: 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Lansing, 1996, pp.217-238; Karin M. Fierke, *Changing Games, Changing Strategies: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in Security*, Manchester, 1998; Christina Schäffne, "Building a European House? Or at Two Speeds into a Dead End? Metaphors in the Debate on the United Europe", in Andreas Musolff, Christina Schäffer, and Michael Townson eds., *Conceiving of Europe: Diversity in Unity*, Aldershot, 1996, pp.31-59; Karin Böke, "Die Invasion aus den Armenhäusern Europas, Metaphern im Einwanderungsdiskurs", in Mathias Jung, Martin Wengeler, Karin Böke eds., *Die Sprache des Migrationsdiskurses, Das Reden über Ausländer in Medien, Politik und Alltag*, Opladen 1997, pp.164-193.

[3] Maja Zehfuß, Sprachlosigkeit schränkt ein, Zur Bedeutung von Sprache in konstruktivistischen Theorien,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998, 5:1, S.109-137.

[4] Thomas Risse-Kappen, Reden ist nicht billig, Zur Debatte um Kommunikation und Rationalität,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995, 2:1, S.171-184; Philipp Genschel / Thomas Plümper, Wenn Reden Silber und Handeln Gold ist, Kooperation und Kommunikation in der internationalen Bankenregulierung,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996, 3:2, S. 225-254; Frank Schimmelfennig, Rhetorisches Handeln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997, 4:2, S.219-254; Matthias Ecker-Ehrhardt, Alles nur Rhetorik? Der ideelle Vorder- und Hintergrund der deutschen Debatte über die EU-Osterweiterung,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2002, 9:2, S.209-252.

[5] Rainer Hülsen, *Metapher der EU-Erweiterung als Konstruktionen europäischer Identität*, Baden-Baden 2003.

[6] Zumindest so viel hat die Diskursanalyse mit der qualitativen Inhaltsanalyse, klassisch: Mayring 2000 und der ZIB-Debatte über kommunikatives Handeln gemein.

[7] Emanuel Adler,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2002, pp.95-118.

[8] Jennifer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1999, pp.225-254.

[9] Reiner Keller, *Diskursanalyse*, in Hitzler/Honer (Hrs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Eine Einführung*, Opladen, 1997, S.309-333.

[10] Henrik Larsen, *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rance,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1997.

[11] 如隐喻所在的文本语境/隐喻中句子或段落。

(译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博士, 上海, 200083)

收稿日期: 2008年3月